

新中国前30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变迁  
改革开放后的学院知识分子  
大学教师的角色变迁  
治学规范  
大众化知识分子

# 中国大学的 理性之路

侯定凯◎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为教育领导者的大学校长  
执着的理想主义者

建国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演变

知识、信仰与大学理性  
大学理性——德国大学的贡献  
大学理性的相对性

# 中国大学的 理性之路

侯定凯◎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 / 侯定凯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大学馆)

ISBN 978 - 7 - 5617 - 7119 - 8

I. 中… II. 侯…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IV. G6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9303 号

## 中国大学的理性之路

撰 著 侯定凯  
责任编辑 彭呈军  
审读编辑 赵成亮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 - 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1.75  
字 数 18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7119 - 8 / G · 4113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1949年8月,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于是中国人开始熟悉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当然,他更多的是作为一名政治人物,而非一名文化使者或大学校长,被中国人民记取的。毛泽东如此介绍这位美国人:“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在文章最后说:“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sup>①</sup>

《别了,司徒雷登!》是一份带有嘲讽奚落意味的政治宣言书,毛泽东把司徒雷登大使离开中国,看作“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事实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与司徒雷登有着不错的私人关系。如果不是历史的阴差阳错,作为大使的司徒雷登当时还差一点促成美国与新中国新型的友好关系。<sup>②</sup>新兴的共和国不曾想到的是:当时我们告别的,不只是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更告别和割裂了一段优质的中国大学文化脉络。解放后不久,院校调整的浪潮使司徒雷登亲手创办的燕京大学分崩离析,只留下一幢幢中西合璧、精美绝伦的燕京校舍,留给后人对这位爱吃杭帮菜、会说杭州话、才华横溢的创办者的感喟。作为一位谦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在长达27年的治校生涯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了中国一流的大学。他在那里倡导学术自由,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作为燕大学生和教师的冰心先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校长:“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sup>③</sup>罗义贤在《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一书中曾对燕京大学的成功范式作了如此概括:1. 一元性包容多元性

<sup>①</sup>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1498页。

<sup>②</sup> 有关的历史背景,参见:于鸿升撰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毛泽东与司徒雷登》,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10/content\_128432.htm。

<sup>③</sup> 冰心:《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载王炳根选编:《我自己走过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页。

的思想范式；2. 兼长并举的文化范式；3. 规则结合情感的变革与管理范式；4. 注重衍生效应的行为范式。<sup>①</sup> 后来，司徒雷登留下的文化遗产被完全吞没在雷厉风行的“向苏联学习”的浪潮中。从此，中国人立志要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化和教育制度和秩序，这一探索的道路一直走到今天！

有朋友曾生动地将近几十年中国大学状况比喻为“盆景艺术”。所谓“盆景”，多有斧凿、修正、刻意、脆弱、功利性（仅为观赏之用）等特点。而盆景艺术所丧失的，正是那种自然本真、充满活力的生物原生态特性。大学发展需要国际的相互借鉴，大学也需要回应它赖以存在的社会的条件和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是特定社会土壤和气候的“制成品”。但是，任何健康的大学发展都有赖于超越“盆景式”束缚的大学生态环境——一种合乎大学理性的成长环境。所谓“大学理性”，就是我们视大学为探索高深学问和普遍真理的场所；就是我们认同，大学里人们对真理的探索是出自纯粹的理性冲动，而非“别有用心”。这就要求大学教育重视自由教育，重视心智的训练，以培养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大学理性是大学在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中，对外部世界达到最完全认识的能力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稳定特征。换句话说，大学理性首先是一种历史与文化传统，它既是稳定的，又是进步的；其次，大学理性还是一种大学哲学观和方法论，关系到大学如何认识自身以及如何对待外部世界的问题。<sup>②</sup> 本书将以中国大学最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为背景，描述和评价社会变迁背后中国大学理性发展的轨迹。

围绕知识的高等教育认识论问题，一直是大学理性的核心问题之一。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任何一次高等教育机构或制度的变迁，往往都是人类积极探寻高深学问活动以致理性繁荣的结果。与理性思想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相适应，世界各大文明的高等教育机构，都从文化和制度的角度诠释着大学理性的本质。<sup>③</sup> 从古希腊学园到中世纪大学，从近代偏重教学的英式大学到偏重研究的德式大学，再到现代教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美式大学，大学理性无时不贯穿于其中。首先，知识与理性是整个学术系统工作的基本材料和基本工具，教学和研究则是操作这种材料和工具的基本活动；其次，大学的研究对象——“高深学问”——本身就是大学基于自身理性执着追求的结果；最后，现代大学所倡导的社会服务，必定是大学应用自身所特

① 转引自沈建中：《走近司徒雷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② 关于大学理性的内涵、世界大学发展历史中理性的展现方式，详见张学文：《大学理性：历史传统与现实追求》，载《教育研究》，2008（1）。

③ 张学文：《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理性与大学责任》，载《科学时报》，2007-11-13。

有的高深知识和学术理性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过程。现代大学三大功能的合法地位的获得,分别在不同时期以不同途径出现于不同社会,然而,大学理性中的“价值自由”与客观性,依然是大学发展的至高原则。本书希望寻找在中国语境下大学理性原则的发展轨迹!

我相信,一个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一种超越物质外表的抽象道理,一种规则、规律、秩序,而且它严格遵守逻辑和实证思想,这就是希腊的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学园(academy)留下来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也应该是现代大学精神。以理性为主导的认识论高等教育哲学,把大学视为理性的产物和理性的工具,是探索高深学问和普遍真理的场所。大学对真理的探索出自不计功利得失的纯粹理性冲动,出于同样的逻辑,大学重视自由教育,培养精神自由的人。正是认识论及其理性思维的发展,推动了大学这种特殊组织的机构演化与制度变迁,而围绕知识的认识论问题就是大学理性的中心议题。

毫无疑问,大学理性在实践中的内涵是丰富多样的。例如,对学术领域的价值自由,中国和西方就存在差异。西方大学更强调知识的中立,强调知识与政治的分离;而在中国学者看来,学术自由强调知识的整体性(知识与社会的联系)以及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等。“位卑未敢忘忧国”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不变的学术操守,当然这一品质也蕴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某些悲剧性元素。无论中外,学术自由、大学自治从来都是学术力量与非学术力量、大学与其他社会力量斗争的结果,所不同的是: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只是被不断地讨论、期待,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被制度化。很多人都意识到教育改革中“观念先行”的重要性,但是即使观念确定为法律条文又如何?身处学术第一线的学者都在不断反思学术、教育的真谛,思考的结果却是:他们只能接受一种折衷的学术自由——比如,以政治承诺换取学术自由。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渴望改变大学依附于政治,或大学过于市场化的局面,但是他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改变这种依附关系的力量,还是有赖于开明的政府领导人!

新中国大学的变迁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高度的同步性和同质性,体现出所谓的高等教育的“政治哲学”,这给我们分析大学内在的“认知理性”带来了困难。作者也曾经自问:中国的大学是否存在过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理性?现在我们是否还需要以学术理性作为指南?对此我认为:第一,作为一种哲学观的大学理性,除了以某个教育家或哲学家的大学思想为研究对象,还应该考察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环境下,大学如何认识自我、如何处理自

身与环境的关系(或者政府对待大学的态度、推行的政策)——这些实践活动本身并不一定体现为大学理性,但至少可以考察大学理性的相对地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缺乏理性,并不排斥个别的大学、大学内部和个人在这些“微观领域”中理性的“闪光点”!

本书旨在挖掘中国大学超越短视和功利主义的努力及其所遇到的困境。我们相信,“学术盆景”中的世界依然有其内在、独特的理性生命力,任何时期的中国大学都会在某些角落保留它未来勃兴的种子——这是中国大学未来发展的基础。中国大学的理性是历史继承、自我探索、国际影响等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是理性精神、精英意识和卓越原则与世俗力量相互制衡的结果。新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一直受到知识理性、工具主义等多重力量的影响。当今中国的大学又面临在教育服务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传承和培育社会文明、发展科学知识、建设大学自身的制度等复杂的挑战。如果我们期待大学能继续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和国家环境有所贡献的话,那么必然需要重新考虑并权衡大学赖以生存的基本价值观:学术自由、卓越的学术水准、学术事业至高权威、个人权利与合法利益,等等。而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大学作为这个世俗社会中理性精神、精英意识与卓越原则的发源地与贮存库,还必须意识到独立于各种世俗力量之外的意义——它应当在某种程度上超越“公共职能”,因为大学本身就内含理性至上的逻辑渊源。<sup>①</sup>虽然大学理性主义的“痕迹”在我国大学和社会发展的斑斓图景中显得断断续续、若隐若现,但我们相信,这些力量在大学未来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制衡和引领作用。本书不是简单地批评和解构,而是寻找中国大学得以存在、绵延乃至如今不断融入世界学术发展潮流的内在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该书的基调是积极的,它是将普适性的大学理性原则还原于中国大学实践的一次尝试。

本书主要探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希望揭示中国大学在广泛而长远的政治、行政、经济等非学术力量影响下,知识理性在中国特殊语境下的表现形式。由于中国大学的起源和发展历程有别于西方大学,挖掘中国大学中的学术因素,既是深化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理念认识的需要,也是思考中国大学如何在市场化、全球化经济背景下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題,以及深化中国大学文化认同的需要。中国大学理性的建立过程,注定将经历困境和循环往复——如同中国大学曾经经历过的那

---

<sup>①</sup> 张学文:《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理性与大学责任》,载《科学时报》,2007-11-13。

样。讲述60年以前的中国大学,我们可以找到大量聊以自慰的“传说”和“传奇”;但关注近60年间中国大学的变迁,更有助我们认识当前问题的根源。对于历史我们有一种奇怪的习惯:喜欢倾听年代久远的传奇(一如连篇累牍的古装电视片),却不愿意凝视近在咫尺的故事。在关于中国大学历史的专著中,描写解放以前的文字总是那么栩栩如生、细致入微,犹如“彩色电影”;但是关于解放以后大学的历史书,却突然成了色彩单调的“黑白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对眼前历史反思的艰难本身说明了反思本身的重要性。这种反思精神本身,也是大学理性的一部分。

具体到本书的结构安排,各章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将联系世界大学的发展历史,回答大学理性的内涵问题。理性与宗教信仰有关,大学通过宗教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知识理性的基本雏形。真正奠定现代大学理性基础的,是康德思想指引下的德国大学。那是一种体现和谐的大学理性:国家办大学,同时又赋予大学以自主性;强调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同时又不流于传统虚无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膨胀。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平衡的理性依然有其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向作用。而当我们要将这样的理性真正付诸实践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大学理性的相对性,警惕理性绝对化带来的恶果。信仰时代要理性的制衡,理性的时代同样需要情感的制衡。真正深入学者的情感世界,我们就可以发现知识理性原本与人类最纯真、自然的本性浑然天成。

中国传统社会奉行的实践理性主义和官僚主义,正好为如今中国大学奉行的实用主义和官僚主义埋下了伏笔。在中国的语境下,大学的自主权包含了太多复杂的意义:不仅包括大学独立于意识形态,还包括独立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不仅需要政策上的承诺,更需要法律上的落实;不仅需要扩大自主权,更需要体现学术自治的核心,做到大学自治的“形”、“神”皆备。同时,落实大学自主权的过程,也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的过程。政府在大学公共性问题上的担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修补因大学自主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现象。本书的第二章将涉及我国的大学自主权这个被一直被讨论,却依然扑朔迷离的话题。

在第三章,我们将讨论大学自主权、大学理想的“代言人”——大学校长——的角色问题。人们习惯于将当今中国大学校长的“身份”理解为政府官员。虽然制度环境对校长自主性发挥有不利(甚至险恶)的一面,但许多中国大学的校长依旧凭借自己对学术世界的深刻理解和体认,凭借自己的领导艺术和人格修养,更凭借自己学术理想主义的执著,在各自的岗位上追



求着大学理性。他们的领导业绩可能不如西方或 20 世纪早期中国大学校长那样广为人知,但是他们的贡献依旧让我们肃然起敬,他们的精神有待更多大学校长们去传承。

第四章的“主角”是大学精神的另一个“代言人”——大学教师。虽然知识分子掌握着尖端的学识,拥有睿智的思想,但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知识分子)却是被“思想改造”的对象。传统上,中国知识分子有参与政治的热情,但他们也曾经成为这些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事实上,学者依然可以参与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就像中国的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做的那样。然而信息化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变得更加模糊(甚至混乱):娱乐化、政治化、商业化……让他们离应承担的社会期许和知识分子的操守越来越远。

从知识类型看,科学知识似乎比人文知识更能代表大学的理性。但有意思的是:不断提出、界定和拷问大学理性问题的,通常是那些人文学者,而不是自然科学家。第五章中我试图想说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遵循了不同的理性标准,它们的互补性让知识理性保持了对于人类的巨大价值。这种互补性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章还特别讨论了我国大学中语言教育的人文意义。

精英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人才培养的精英化体现了客观知识的分层格局,同时也体现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层格局。在第六章中,我将回顾我国精英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方式历经的变化。教育民主化和精英化的矛盾始终存在。大学需要采取多种方式和标准,照顾不同社会群体的入学机会,但这样的政策很容易被现有的社会精英阶层所利用,从而走向教育民主和公正的反面。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精英人才应该如何培养?精英教育是可以统一规划的吗?

本书最后将回到大学的课堂教学问题上。大学教育的理性具体体现在教师对知识的加工和传授方式上。知识理性需要教学过程体现知识发现和学习的内在逻辑。同时,制度化的知识需要特别强调知识的开放性。在知识控制和评价问题上,我们特别需要警惕知识管理中的“行政化”、“麦当劳化”的思维倾向。

19 世纪末,近代意义上的大学在中国诞生之时,恰逢欧洲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烈冲突。这一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 21 世纪,全球化浪潮也没有让这样的冲突得以缓解。中国教育对西方长期的依附关系,让身处制度变幻中的学院人无法找到自我认同。如今,我们慢慢看到了中国学

术地位确立的契机,比如我们开始对普遍认同的学术规范、学术伦理有所警醒;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走进中国大学,试图了解这个迅速崛起的经济实体背后的文化基础;中国学术界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挖掘和守护本民族的传统元素,来抗衡“肆无忌惮”的西方主义和功利主义;尤其可贵的是,有更多的学者超越了各自的学科视野,深入地讨论中国大学的精神、气质、灵魂这样一些抽象、沉重而极富思想冲击力的命题。围绕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的大讨论,就是一次有关大学精神的很好的启蒙。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关于现代大学理念、大学个性、自由文化等思想的熏陶。只有当我们将大学视为一种文化存在,而非政治或经济存在时,大学的本质才能被触及——大学的开放性、独立性、包容性,都源自大学的文化基因。

十多年前,许美德曾提出,中国完全有可能发展市场化了的高等教育,两极分化严重,所设专业和课程直接为经济服务,而在促进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方面却做得远远不够。<sup>①</sup>中国的大学如何更好地为不断崛起的“经济中国”注入文化的力量和厚度呢?梁治平先生在其《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的自序中说:“虽然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不得不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根植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我坚定地相信兼容并蓄的力量,而且我也坚定地相信,所谓“中国特色”的大学,不是在洋房顶上加一个中国式飞檐那样简单,需要具有传统情怀的人们将中国大学置于更广阔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来进行讨论、反思。当中国大学的问题真正交由中国学者自己来解决时,中国式的现代大学就指日可待了!

---

<sup>①</sup> 许美德:《中国大学——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 前言 / 1

## 第一章 大学理性：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 / 1

知识、信仰与大学理性 / 4

大学理性——德国大学的贡献 / 8

大学理性的相对性 / 13

## 第二章 盆景中的春色：大学的自治问题 / 19

建国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演变 / 22

《高等教育法》颁布后高校自主权的进展 / 29

高等教育公共性的实现：途径和问题 / 34

公民社会中的大学自治 / 39

## 第三章 大学校长 / 43

大学校长：从体制变迁的角度看 / 46

作为政府官员的大学校长 / 51

作为政府与大学之间“缓冲地带”的校长 / 53

校长与党委书记 / 56

作为教育领导者的大学校长 / 58

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 60

## 第四章 学院知识分子 / 65

新中国前 30 年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 / 66

改革开放后的学院知识分子 / 72

大学教师的角色变迁 / 76

治学规范 / 80

知识分子的大众化 / 82

学术与政治：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 /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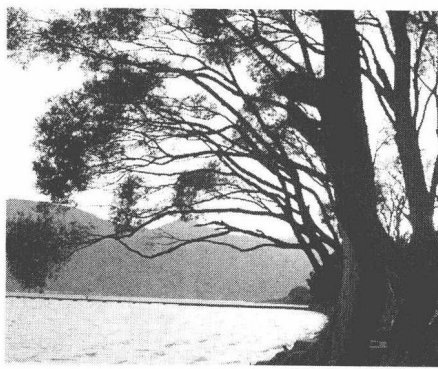
第五章	人文教育的使命 / 93
	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 / 96
	大学语文教育 / 99
	人文教育的政治化 / 104
	世纪末的人文教育亮色 / 109
	大学通识教育的展望 / 116
第六章	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冲突 / 121
	精英选拔机制：入学标准 / 122
	中国式“赞助性行动”计划 / 131
	精英“文化资本”的习得 / 136
	精英“政治资本”的习得 / 138
	“制造”精英 / 140
第七章	大学课堂：教学的理性 / 147
	大学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历程 / 149
	课程改革中的知识化倾向 / 155
	课堂教学中的理性 / 158
	从“国家精品课程”看大学知识的开放性 / 162
	知识控制：教学评价制度的合理性 / 167
	大学教学的研究 / 171
	后记 / 176

---

## 第一章 大学理性：一份共同的文化遗产

---

- 知识、信仰与大学理性
- 大学理性——德国大学的贡献
- 大学理性的相对性



早在1918年,美国制度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在其所著的《美国的高深学问》(*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中详尽地描绘和嘲笑了形形色色的美国大学经营中的商业现象以及学术领域自主权丧失的现象,该书的副标题即“一份关于商人干预大学的备忘录”(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 men)。<sup>①</sup> 几乎在同时,蔡元培先生在1917年的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说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而在《北大一九二二年始业式演说辞》中,蔡元培强调:“本校的宗旨,每年开学的时候总说一遍,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sup>②</sup>

此后的近一百年间,世界大学的形态和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解放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部分被肢解了。各高校按照实用目标的需要,分解为独立的专门学院,学院再分解为若干系和教研室。高等院校基本丧失了研究功能,只是单纯教学机构,用现成知识培训各类专业实用人才,由于缺乏宽厚的知识基础,学生只会简单的工作技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60年代,高校成为革命激情的策源地。青年运动的非理性狂热,点燃了乌托邦的政治信仰,彻底破坏了本来就薄弱的大学学术基础。大学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刻意强调工农兵的主体地位,瓦解了大学文化超越社会大众的独立性,政治统率一切,学术完全成为摆设。后来,工农兵大学生的文化素养大大下降,更易被官僚化的权力所操纵。<sup>③</sup>

中国改革开放后30年,大学进行了“去政治化”的改革,大学教育的航道指向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教育内容和制度的不断改革,并没有让大学朝着学术界和公众更加满意的方向前进。现在人们怀念蔡元培,是因为他有执著的教育理想;但如今大学领导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一百年前智者们提出的教育问题。事实上,大学在诸多问题上已经丧失了基

① 参见 Thorstein Veblen (1957),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York: Sagamore Press.

② 转引自高伟强等:《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③ 姚国华:《大学的尴尬: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泛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311fb1010008yc.html。

本的方向感：哪些教育内容是可以灵活变通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恒久保持的？大学首先需要满足教育消费者的短期需求，还是首先满足学术发展的长远需求？学术繁荣下，学生究竟受到了多少有意义的教育？研究人员在获得日益丰厚的社会和政府资助时，是否顾忌过学术伦理和独立批判的精神？如今又有人提出，要像攻克经济体制的“堡垒”一样，攻克高等教育这个改革年代的“最后堡垒”！号角已经吹响，令人担心的是：我们究竟要用改革开放创造的巨大经济财富，去摧毁一个怎样的高等教育旧堡垒？又要建立一个怎样坚不可摧的新堡垒？

作为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一种文化机构，中国大学继承了西方大学的一般特性。诸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思想顽强地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缺乏制度理性的国度生根发芽。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对于漫长的文明史来说，只是晚近之事，但并不是说，中国现代大学仅仅是西方大学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中国现代大学的先驱都是同时具有世界眼光和中国胸怀的人。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人并没有在留学欧美时，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格式化”。他们是“亦新亦旧”的一代。即使是那些在中国传教兴学的西方人士，也深知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当年作为教会学校的燕京大学，强调在新生录取所需的60个学时中，必须有12个为中国文学，4个为中国历史。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必须在一年级或二年级时选上一年的中文。<sup>①</sup>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和知识体系中也存在大量与现代大学理性相契合的成分，这些成分有望转化为建立现代中国大学制度的材料。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劫难，但依然有丰富的文化原生态有待萃取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魅力远远没有被学术界挖掘，当然也没有被我们的学生充分地体验。当前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受冷落，教育者自身的传统修养不足是重要的因素！从教育制度角度看，历经千年、在20世纪初被废止的书院，就是一笔值得现代大学教育改革借鉴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在教育体制上，发挥私立、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在教育理念上，全人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和沟通。<sup>②</sup>

① 高伟强等：《民国著名大学校长（1912—1949）》，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87页。

② 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转型期的社会通常伴随权力和利益的重组、冲突和价值观的失衡，而大学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组织，有可能超越集团利益而成为促进社会稳定进步的力量。大学的超越性来自它承载的文化使命：培育公民意识、独立意志、公平意识、公共道德等理性素养。这些大学的价值观并不存在广为认同的内涵，也并非一定能被所有的社会形态所接受，但是这些理念总是会在历史长河中被不同的社会反复提出、被讨论和赋予新意。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大学文化虽然有时慵懒，有时激进，有时与世无争，有时愤世嫉俗，却最终能成为社会新秩序的建设力量？大学的理性存在意义是双重的：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它不但提供世俗的人力资源，更提供制衡社会发展的思想力量；对于追求精神皈依的人来说（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需求），大学是一个安全和积极的精神“避风港”——他们可以在此获得身份认同，并用精致和优雅的方式从事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活动。

### 知识、信仰与大学理性

在历史长河中，知识与信仰长期处于相互对立和冲突中。早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信仰先于知识的观点。古罗马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公开反对理性，与不信仰基督的人为敌。由于宗教信条不可能从逻辑上加以证明、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基督教神学家便宣称“最高理想”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达到。这种“信仰主义”在中世纪到达了顶峰。神学信仰的地位受到真正挑战，是在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 F·培根认为，知识的基础必须是实验和观察，而不是《圣经》的词句。<sup>①</sup>

但至少在中世纪的大学，人类的理性超越了“知识”和“宗教信仰”之争，从而体现为一种制度的理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知识传播的行为得到了保护和宽容；二，大学知识探究的过程体现了某种实证主义精神。根据荷兰历史学家彼得·李伯庚的研究，1158年1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发布命令，一切学生和教师（尤其是讲授神圣法律的学者），为教育而在帝国各地旅行，一律受到安全保护。而在当时巴黎大学著名学者彼得·阿伯拉的教学讲义上，我们发现了那时大学教师

---

<sup>①</sup> 董雅华：《知识、信仰、现代化——中国政治社会化中的高等教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的工作方法已经显示了一种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

“……如果对一个事物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就需要深入讨论，这个事物涉及的基本概念是什么？各种不同的说法，是否有助于阐明这个基本概念在不同情况下的含义？各种不同说法，是否有助于丰富对事物的认识？在这样的讨论中，可以探索不同看法之间的共同点，寻求它们是否能够统一起来……如果你认为《圣经》中的某个地方说得不对，不能就此认为《圣经》某卷的作者背离了真理；有时手抄本抄错了，有时可能翻译错了，也可能是你自己没有读懂。如果从后来的著述中发现有背离真理的地方，读者或听者可以自己判断、评论，决定取舍的态度，但也要注意这本著作的观点是否有其充分的理由。”<sup>①</sup>

李伯庚认为，这种理性的、逻辑性很强的实验主义观察方法，可能是基督教学者和西班牙的伊斯兰大学里的穆斯林学者接触的结果，因为“基督徒不学习物理学和其他实践科学”，在伊斯兰思想中，对经验的重视远远超过基督教思想中对此的认识。<sup>②</sup> 确实，伊斯兰教育是世界教育史上重要的篇章之一，其成就可以看作阿拉伯人对希腊文明的一种智慧的继承。正如罗马人曾经学习希腊人并吸收和适应他们的文化一样，阿拉伯人也学习、吸收并适应了希腊的文化。但两者是不同的……阿拉伯从希腊借来的是科学和哲学。

李伯庚进一步分析道，传统的基督教经院文化和新的科学文化之间，势必形成冲突，它是由来已久的希腊古典文化和基督神学之间冲突的继续。托马斯·阿奎那希望解决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信仰超越理解，因此我们所信的不能凭智性去论证。但信仰又是真实存在的，因此与理性并不冲突，因此也不会被理性的争辩所推翻。<sup>③</sup> 遗憾的是，这样理性与信仰的“和谐理论”并没有体现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理性的愿望似乎只停留于少数智者。就像一位 13 世纪的神职人员对巴黎大学神学院描述的那样，本地学生和外国学生并没有共同造就包容的环境，却带来了文化上的彼此歧视和诋毁。

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是作为对反抗神性统治而存在的，理性倡导人道、科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重要的人类理念。应该说任何时代的

① 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2-194 页。

② 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4-195 页。

③ 彼得·李伯庚著，赵复三译：《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7 页。